

Asia Pacific Institute of Ageing Studies Newsletter 亞太老年學研究通訊

Volume 1

Article 2

2012

焦點訪談：陳章明教授, BBS 太平紳士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apias_nlj



Part of the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Ecolog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焦點訪談: 陳章明教授, BBS 太平紳士 (2012)。亞太老年學研究通訊, 1, 2-9。檢自:http://commons.ln.edu.hk/apias_nlj/vol1/iss1/2/

This Chinese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Asia-Pacific Institute of Ageing Studies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Asia Pacific Institute of Ageing Studies Newsletter 亞太老年學研究通訊,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陳章明教授, BBS, 太平紳士, 研究老年學三十載, 多年來積極關注並參與香港及亞太地區之老年相關議題與事務。

身為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總監, 陳教授不但醉心研究, 努力尋找和分析社會現存的老年議題, 亦針對觀察到的問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他強調代與代之間知識傳承的重要, 推廣終生學習的理念, 更重視通過培訓提升社區保健及相關行業服務提供者的服務質素。

陳教授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亦為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就老年事務擔當顧問。他一直熱衷參與決策機關的諮詢工作, 期望藉此在公共決策上發揮影響力, 改善香港長者的生活素質。

不若原先預想的寬敞、放滿古瓶字畫的辦公室, 陳教授的辦公室相當簡樸精巧, 四面被放滿書籍的鐵製書架包圍, 案頭堆滿厚厚的文件。他談笑風生, 但不乏深度; 即便被問及較為私人的問題亦對答自如, 不失風度。他說話神態自若, 言談之間彷彿有著一種吸引力, 教聽眾著迷。

香港老年人口所帶來的挑戰

記: 今天想請教兩方面的問題, 首先當然是關於香港老年化的概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全球都經歷著由人

口老化所帶來的人口結構轉變, 您認為這現象為香港帶來了甚麼機遇和挑戰?

陳: 全球60歲以上的人口正顯著地急速上升, 全世界的人都普遍長壽, 這情況為各地政府帶來嚴峻的挑戰。

現時大多數國家以60歲為退休年齡, 退休人士會大幅增多, 當中不乏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長者, 他們會依賴政府的社會保障系統, 為政府的財政開支帶來沉重的壓力。

香港市民平均壽命約為85至86歲, 而約十多年後香港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年屆60歲以上的長者。

在以前人均壽命只有6、70歲時, 老年相關疾病很難被察覺。以失智症為例, 以前沒有很多病例, 因為很多人在病症明顯前已經去世。但現在此病卻很普遍, 患病人數佔老年相關疾病的比例由以往的10%上升至現在的30%。

再者, 失智症是因為近年諾貝爾得主高錕教授患病才開始備受關注。這亦意味



焦點訪談

陳章明教授, BBS, 太平紳士





著老年疾病能影響所有人，天才也不例外，因為退化是人生必經階段。而健康轉差會為政府構成龐大的醫療開支。

柳暗花明

記：看來我們正處於一個很不妙的狀況？

陳：我們是危中有機，就看我們如何把握時間及機遇，轉危為機。香港為知識型經濟體，因此，專業、經驗以及學識都為市場所重視。長者經過年月的累積，上述三項要素亦變得豐富。

為應對逐漸減少的勞動力及不斷舉升的受養人口，我們應該鼓勵有能力繼續貢獻社會的長者不要太早退休。

與此同時，我們要留意香港在開拓「銀髮市場」方面的滯後。不少先進國家如日本和美國，他們的商家都已經從針對年輕消費者轉向40歲以上的一群，因為後者有著更強的消費能力，會購入如汽車、物業等高價產品。

即使我們社會正在老化，我們還有三兩年的時間準備踏入一個成熟階段的老年社會，到時候受供養人口將會比工作人口多。我們必須在人生較早階段就推廣健康的生活模式。我們的身體就像機器，需要定期檢查，更不應過份操勞，不然會未老先衰。

更重要的是要提升長者形象，因為他們經常看扁自己，覺得自己沒用和被遺棄。

因此，我們要鼓勵老人家積極參與社會，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智慧傳承給下一代。

他們需要跟更多的年輕人交朋友，可以推動跨代溝通和互助。

這一切都需要政府政策配合。

記：您建議延遲退休，但此舉在歐洲已經引起極大的迴響，就此您又將如何應對？

陳：延遲退休年齡的理念建基於我們預視未來的工作人口將不能支撐受養人口。我們將退休年齡推遲是為了替社會爭取時間，在工作人口下跌前儲備更多的社會資源。

當我們把退休年齡設於60歲時，其實就會將一批有健康、有能力的勞動力趕下崗，勞動人口亦因而減少。如果我們把退休年齡往後推延，就可以讓一班有能力且願意工作的人重新被納入勞動人口之中。一方面長者們可以透過工資在退休前積累更多的資本，我們亦可從稅收等途徑為社會賺取更多的本錢。

歐洲的案例跟我們不同，主要是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了嚴重老化的社會。歐洲在

富裕時沒有為日後的老年社會作積累，現在才開始打算已經太遲。歐洲各國政府將退休年齡延遲，只能推遲向其國民支付退休金的時限。

記：您強調政府介入的重要，但很多時候都是社福界及醫療界走在社會的最前線以彌補政府所不能關顧的缺口，您又怎樣評價它們的表現？

陳：就我的觀察，無論是社福界抑或是醫療界，他們都抱著「補救性」的思維，只會在問題發生時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它們經常強調及放大長者的疾苦，反而強化了「所有長者都等待救援」這一錯誤訊息。

事實上全港只有15%的長者需要協助，其餘的都可以自力更生，只是他們缺乏門路。

因此，社福界和醫療界應該改為致力提升老人形象以及鼓勵長者積極參與社區。

很多人貪圖方便，將安老責任委諸政府及慈善團體，但出動社工、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等專業人士成本昂貴，要求他們去照顧所有老人是不切實際的。



再者，我們本身就面臨專業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們要將有限的資源用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家庭應該負起照顧老人家的責任。除了我們要及早為自己老年打算，我們更應該推廣社區照顧，為老年人口建構一個友善、舒適的環境。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社區人士大多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所以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留意到提供社區培訓的可行性。而推動資歷架構可填補這樣的缺口。透過認證一些有豐富護老經驗、但又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者的護理資格，從而擴充保健行業的人手。

記：您多番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性，而您現在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您將如何運用您的影響力去改善長者的生活素質？

陳：還記得以前我們鄰里之間守望相助的日子嗎？以前是朝不閉戶，現在人們卻重視個人隱私多於友誼，社區欠缺凝聚力。我們需要透過睦鄰關係及友情為長者提供社區護理，而並非如關愛基金般只著重物質援助。

要達到上述目的需要政府跨部門的合作，而非僅由社會福利署承擔。例如在公屋的公共空間設計上著手，令居民有更多的聚腳點，鼓勵溝通互動，這就牽涉到房屋署。

就任政府顧問

記：很多人都對安老事務委員會的顧問性質感到懷疑，認為您們的建議沒有約束力。這樣的話您的委員會又如何影響政府施政？而當中又有多少建議獲有關當局接納和採用呢？面對如此制度的缺憾，您是否會感到無奈而萌生去意？

陳：我才剛上任不久，仍未知道是否會因為任何原因而沮喪，但我得承認安老事務委員會只是顧問組織，建議並無約束力。不過我可以參考前任主席梁智鴻醫生的經驗，即「實事求是」，提出實際可行的建議。唯有切實反映香港長者的需要，並提供清晰具體的方案，才有助建議被採納。

我們不應急功近利又或追求不切實際的奢想，流於空談。反而應該腳踏實地，如創立「長者學苑」及推行「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劃，為建構和諧護老的社會播下種子。舉例說，我們的鄰舍計劃就成功阻止了很多發生在獨居長者身上的悲劇。因此，我們的職責不單是幫

助政策的推動，更要把社區的聲音帶入決策當局。

2011年施政報告對安老事務委員會來說是一大驚喜及鼓舞，因為政府不單採納了我們提出的全部建議，當中包括「錢跟老人走」的概念。最意外的是政府更附送擴大長者交通津貼計劃！

全民退休保障需全民共識

記：您指出我們需要踏實緊貼市民大眾的需要，而現在社會出現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訴求，且亦同意我們需要增強老人退休後的保障，那您是否會覺得全民退休保障是一個「假大空」的建議？

陳：我認為這只是一場數字遊戲，看收入能否抵得上全民退休保障帶來的支出。廣義來說，現時只要是年滿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都可申領金額為港幣1035元的高額高齡津貼，這其實也算得上是一項全民退休保障，我們要討論的是這筆錢夠不夠。

假設我們現在採用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支持者所提出的建議，不論長者財富及收入，每人每月領取港幣3000元的補助，再按照現時有約100萬名長者計算，政府每月用於該筆款項的支出為30億，而一年就是360億元。

我們要考慮的不是現在能否支付這金額，而是應該考量未來的負擔能力，因為我們估算未來15年的人口結構長者人數會增加一倍。



人口老化令勞動人口減少，從而政府所得的稅收下降，我們的「人口紅利」將於2015年用盡。面對如此龐大的經常性開支，政府的精算師也不能令收支平衡。

唯一的辦法是加稅，亦即是從你和我的錢包裡掏錢。

我個人來說當然贊成這政策的實施，因為很快我就會成為其中一個受惠者。但下一代又怎樣呢？他們又是否願意負擔？因此這建議在推動前需要全民的共識及周詳的考慮。

邁向老年之路

記：以下的時間我會問及一些關於您比較私人的問題，希望對您的事業和與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淵源有更多了解。您在老年學及相關界別工作有30年之久，回顧過去，面對很多不同的選擇，是甚麼驅使您發展老年相關事業？

陳：我在英國是當社工出身的，而我第一批服務對象是濫用藥物，或有家庭問題的年青人。

不過年青人只會在犯錯時才聽你講，當他們的問題解決後就不會再理會你。而遇到家庭問題的青人亦一樣，只要問題解決他們就不會想跟你再有任何瓜葛。但我不會覺得他們忘恩負義，始終他們是在人生的低潮跟我認識，跟我碰面難免會勾起他們傷痛的回憶。但無論如何，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我轉到愛丁堡後開始接觸長者，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比服務青年人更溫情的經驗。當你幫助過一些長者，他們會將你的恩惠銘記於心。很多老人家更會把你當成家族的一員，會跟你分享美食和內心世界。就是這種從長者身上感受到的溫馨吸引我從事老人服務。

八十年代回到香港後，我便在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任教。眾所周知，社會科學本身亦有很多不同的專業，包括婦女問題、青少年問題等。但當年老年化現象在香港並不明顯，並沒有太多人關注長者服務的問題，更認為老年學是次等專業。



然而，我在英國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香港在不久亦會同樣面對老年化的挑戰，於是我毅然投身長者服務機構工作以積累更多前線經驗。兩年後，我輾轉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並由那時起獲邀加入安老事務委員會服務至今。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記：在您三十年的事業中有沒有遇過一些難忘和值得分享的經驗？

陳：我發覺長者都把「死」看的很輕。年輕人通常都認為在老人面前提及死亡是禁忌，但事實上長者都認為死是人生必經階段，並不介意談論。同時，長者亦非常關注年輕人的成長發展。就如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長者們都放下政治分歧，哀悼失去的眾多年輕生命。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家庭亦面對老齡化的問題。我先父患有失智症，並由我的妹妹負責照顧。就如所有的失智症患者一樣，我父親的善忘甚至幻覺都令家人很頭痛。幸運的是，我能夠應用我的專業知識，教導我妹妹正確處理失智症患者的方法後，他們都能夠好好相處。這個人經驗驅使我更努力改善香港的退休環境，亦令我對老年政策更有要求。

陳教授與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不解緣

記：那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是怎樣成立，而您又為甚麼選擇參與其中？

陳：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耀教授早就預視香港會承受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挑戰，於是他成立這個以亞太區為中心的研究單位，藉以協助大學發展老年學。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設立是為了探討香港以至亞太區的老年化現象及老年相關政策，亦為新生代面對老齡社會作準備。透過我在老年學的多年經驗和專業知識，我有信心帶領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在研究、課程發展以及顧問服務方面更上一層樓。

本研究中心的發展方向與市民所需並行。就如我之前所說，我們的建議不能與社會訴求及政府能力有太大落差，我們亦不能建議力不能及的事。

記：您又怎樣評價自己和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陳：比起其他大專院校，嶺南大學在資源上明顯顯得貧乏，但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工作仍然能夠走在本地甚至國際的尖端。能夠跟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等大型國際組織合作，實在是一大鼓舞，是對我們努力和成果的肯定。但這功勞不是我個人的，而是屬於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整個團隊，以及協助我們研究的各方好友。



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會訊創刊

記：您對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會訊創刊有甚麼期望？

陳：首先，我想為我們的讀者，尤其是長者，提供亞太區內最新的老年學發展資訊，例如醫療技術、政策發展等等。另外，我亦希望讀者能夠對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的實質工作和貢獻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份會訊亦可以成為促進學術機構之間互動和交流的平台。由於老年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不同的群體需要透過溝通和分享知識及意見以建構一個最佳的退休環境。

記：謝謝您接受訪問！

陳：不客氣。

